

图片虽不够清晰,但画面中,曾经威振四方的开国名将王震,拿起劳动工具种橡胶并开怀大笑的场景,不仅让人体会出王震当年的大将风度,还能把人的思绪,带回到那特殊年代的特殊使命和特殊事件中。

资料显示,从1957年到1988年间,王震曾7次来到海南,其中有6次到了位于五指山南麓、响水河西岸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金江农场。据历史资料记载,它们分别是1957年、1958年、1959年、1960年、1966年、1986年。

“照片上这生动的一瞬,记录的是王震第三次到金江农场,与职工一起劳动的场景。”海南省农垦总局档案馆退休老馆长叶世道告诉记者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,让王震将军那样情有独钟?那里有着怎样的事业和故事,让他那样牵挂,让他割舍不下?

1957年第一次视察： 开辟试验田

1956年时,海南农垦有6个新成立的农场,即新星、新中、新进和金江、龙江、阳江,统称“三新”、“三江”。

今年82岁的李万福,1956年到1970年,一直担任金江农场场长。他回忆说,1957年3月,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,第一次到海南垦区检查工作。王震乘车从海口到三亚时,正好经过就在海榆中线路边的金江农场,便提出到农场看看。这一看,就结下了缘。

当时,初建不久的金江农场机关还没在几间茅草房里。王震和大家讨论农场的开拓建设前景,研究橡胶的栽培技术和种植规划,并决定把金江农场作为自己的工作联系点。

那一天,王震亲自来到三区15队,选择了一块既可避风、又相对肥沃的林地,决定采用扩大环山行、修筑保水、保土、保肥田埂的方法,建立33亩速生高产试验田。之后,他每次来到农场,都要到这块试验田看看,还加施施肥管理。试验田在一处高山的山脚下,地势不平,却修整得很规则。

此后,王震经常到金江农场蹲点,还亲自和工人们一起投身到开垦胶园的会战。他带领大家开辟的试验田,长势很好,仅用了6年多就达到开割标准。试验田的高产栽培技术措施,当时也在海南各橡胶农场和农村社队推广。由于管理严格,科学,40多年来年均亩产干胶80.5公斤,达到了高产、稳产的效果。

李万福说,深挖穴、压绿肥等经验,都是从金江农场总结出来并推广的。

如今那些已有50年树龄的老胶树,仍然能生产胶水。在试验田边缘的路旁,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记载着试验田的创立经过。王震在担任农垦部长期间,把大量心血倾注在南方热带亚热带垦区的开发建设上。为提高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科技含量,1957

从1957年到1988年,王震曾7次来海南,其中6次到位于五指山南麓、响水河西岸的金江农场视察——

那块让将军牵挂 30 年的试验田

本报记者 孙乐明 通讯员 王家东 实习生 朱冬梅

年他决定成立热带作物研究院,并决定将院址选在海南的儋州。1958年,王震亲自参加建院劳动。为提高橡胶种管水平,王震选择海南农垦的“三新”、“三江”6个农场作为农垦部工作点。

1959年第三次视察： 送来良种鸡蛋、花生种子

1959年,王震主持召开云南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省区农垦工作会议,特意把会址选在金江农场。

这一次,他风尘仆仆来到金江农场,当看到工人因自然灾害忍受饥饿仍坚持开荒种胶时,他的眼睛湿润了。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们不仅要种好橡胶,还要把职工生活搞好,要种好菜、养好猪,还要养鸡、养牛,建好房子,办好医院。”

当他看到一户农民在自家门口种菜时,马上回头叫来场长说:人家都能种好菜,农场为什么就不能种?在王震精心安排下,从北大荒运来了良种鸡蛋,从上海调来4台鸡蛋电孵器,又从河南调来一批花生种子。农场办起了养鸡场、养猪场,1961年饲养4万多只鸡,产猪肉2万多斤,种下的花生也收获了8万多斤。

王震在金江农场的日子里,不仅足迹遍及农场的主要林段,离开农场后,对这里的建设和职工的生活也十分关心。他先后给农场干部职工写了10多封信,其中1960年1月17日他写给场长李万福并农场党委的信中,特别叮嘱“群众干劲越大,领导上越要关心群众的集体生活,要有劳有逸,劳逸结合。春节时要休息二三天,使全体职工欢度春节。”

在王震将军的直接关怀下,金江农场职工用辛勤的劳动,开垦出8万亩土地,种植大片高产胶园,文化和社会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。

1960年第四次视察： 与工人一起垒梯田

1960年9月的一天,天空下着毛毛细雨,但王震身上穿着风衣,照样来到林段和工人一起搬石头、垒梯田。工人们看到年过半百的老部长干得汗流浹背,有些心疼,便搬来一张藤椅,请他坐下休息会儿再干。但王震摆摆手说:“我难得到这里劳动一次,还是让我多干一会吧!”



1960年,王震第三次到金江农场同职工一起劳动

李万福回忆道,还有一次,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一条河。大家建议绕过去,但王震说,趟过去嘛!说着,自己带头脱掉鞋子,趟水过河。

1986年第六次视察： 为胶树锄草、施肥

1986年10月,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

会副主任的王震,在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陪同下下来海南,又到了金江农场——这是他第六次来,也是最后一次来金江了。

此时,昔日的荒山野岭,已被郁郁葱葱的橡胶林取代;过去的茅屋瓦舍,已变成崭新的楼房。王震心情很好,情绪高涨地提出要去试验田看看。

当时在试验田旁,农场干部周延展拿出一张他保存了二十多年的照片,相片上

清晰地展现着王震1960年代挥锄劳动的情景。王震看了照片,深情地抚摸自己培育的胶树,对旁边的农场干部说:“过去这里是荒山野岭,现在已是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满园,高楼林立,真是旧貌换新颜啊!”

时任农场宣传科科长的张国平回忆说,将军是早晨9点多到农场的,首先就去了橡胶林。他记忆最深的是,在试验田的林段,将军抚摸着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橡胶树,感慨万千。当他见到挂在树上的胶杯盛满雪白的胶乳时,突然来了兴致,把胶杯高高举起,连声说道:“干杯!干杯!”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,逗得周围的人也一边笑着,一边鼓掌。

负责这片胶林管理和割胶的女胶工马美芬,为将军演示了割胶技术。她告诉王震,虽经多次遭受台风袭击,但在她们精心管理下,这里一直是高产林段,每亩可年产干胶80多公斤。王震听后兴奋地说:“感谢大家创造的好成绩。感谢胶工,你们辛苦了!”接着,将军拿起锄头,开始给胶树锄草、施肥。

今年69岁的马美芬,退休后住在海口的女儿家里。她回忆说,由于自己割胶技术过硬,她和胶工林良玉在1970年被农场安排管理试验田。她们知道自己管理的是王震将军的试验田,所以感到无比自豪,也格外用心卖力。她还记得试验田第二排的第二株橡胶树,就是王震将军亲自种植的。每次割那株胶树,都有些别样的心情。

1986年那次为将军演示割胶时,她的心情非常高兴,也有些紧张。正由于紧张,她没有说太多话,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。

“这片胶林毕竟有特殊的意义啊!要技术好的人才能管理这片胶林。”至今说起能为将军管理胶林,她仍然是一脸幸福。后来听说有人建议把这些胶林更新掉,她心里曾感到失落和惋惜。但场长陈锡福坚决不允许,于是这片老胶林保留至今。

1987年8月,王震橡胶试验田纪念碑在金江农场15队胶林落成。这块纪念碑和这片试验田,不仅仅记录着将军对金江农场的牵挂和关心,更承载着共和国开国将军王震、对国家橡胶事业发展以及对共和国农垦事业的绵绵情怀。

1988年：未到金江 心系金江

1988年底,已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,最后一次来到海南。在参加“两院”迁所建院30周年庆祝大会后,他到了三亚,但心头仍然惦记着金江农场。这一次他虽然没有亲自下金江农场,但派秘书专程赶到金江,转达他的慰问,并把场长陈锡福、党委副书记许崇声接到三亚,询问农场情况,鼓励他们搞好生产。

现已退休的陈锡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,王震对农垦橡胶事业的感情,让他们深受感动。当听说农场周边一些胶树被不法分子盗割时,80多岁的将军气愤得站了起来,大声呵斥道:太不象话,一定要狠狠打击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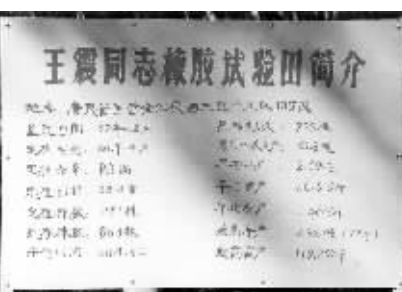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4月,在金江农场举办的王震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,王震的后人王兵、王军、王之等,携家属来到金江农场,寻访父亲当年“六下农场”的足迹。他们在父亲的试验田边留影纪念,拿起扁担簸箕,为试验田橡胶树培土施肥,并捐款10万元作为金江农场学生奖学金。

“将军对金江农场的特殊情缘,是农场的宝贵财富。”老场长陈锡福说。

王震六下金江农场的往事,一直激励着农场干部群众更加努力地工作,成为农场引为自豪的光荣场史。(本报保城9月2日电)



1986年,王震最后一次重返金江农场,在他的橡胶试验田里与职工畅谈。



1960年代,金江农场在王震的橡胶试验田旁立上了简介牌。

读书

书评

●/新著重磅

解放西藏史

本书编委会
中共党史出版社



解放西藏,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,团结、带领西藏人民,把半殖民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西藏“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”,使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挣脱出来,进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,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。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和发展,是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,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篇章。

这部书涉及到解放西藏的全过程,包括政治上的解放、广大农奴的人身解放、西藏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解放,直至社会制度的伟大跨越。时间跨度为十六年。内容涵盖了自然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等各个方面。

编写《解放西藏史》,是资政育人、正本清源、解疑释惑,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,是建设团结、富裕、文明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需要。老一辈解放西藏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精神的一部分,已成为支撑我们推动西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。

●/阅 刊

《大科技·科学之谜》



2009年8月号

“物理学中还有个小妖?”当你读到本期的《物理学上的三个小妖》一文时也许会这么想。的确,物理学是一门严谨的实证科学,按理它跟精灵鬼怪是最不相干。不过,历史上很多大物理学家都是极富有想象力的,很多时候,他们为了有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思想,干脆撇开那些深奥的数学公式,故意捏造出一些妖精来替他们的思想代劳,于是小妖们就这样诞生了。你可别小看这些小妖,在物理学史上她们往往与最深奥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。了解了她们的来龙去脉,你就几乎了解了整整一部近代物理学思想史。

●/书评·社科选萃

民生往事 打开尘封记忆

——《中国生活记忆》读后

■ 苏南坡

封记忆,展示平凡人生,这是图文展示共和国60年百姓生活变迁的史料性作品,是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珍贵礼物,是献给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珍贵礼物。

书中从平常百姓的生活入手,再现共和国60年平常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和那永远抹不去的生活往事。书中内容涵盖了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服饰、饮食、娱乐、住宿、交通、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为共和国60年变迁留下弥足珍贵的图文资料。全书以小见大,从细节展现宏观,从生活方面的变化展示共和国60周年的辉煌成就。

正如这本书的总顾问于光远先生题词所言:记录点滴生活,彰显社会进步。

书中记述了50年代风行中国大街小巷的“列宁装”和“布拉吉”。

书中记述了60年代没有票证就寸步难行的日子:1960年,蔬菜被正式划为“国家二类商品”,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,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,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,葱、姜、蒜也要凭票购买、由“居委会”安排,你能想象吗?

书中记述了70年代,“的确良”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,代表着时髦和前卫;伴随喇叭裤的流行,鞋底也越来越厚,甚至引起趣闻:当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,而她无法脱身时,居然大声威胁“如果你再靠近,我就要从鞋上跳下去”;

书中还记述了80年代的红裙子、假领子、迪斯科、邓丽君和“大哥大”,90年代的“一步裙”、踏脚裤、生猛海鲜、股票、超市和甲A联赛,新千年的“肚兜”、唐装、房奴、

“人造美女”、超级女声和“动车组”……

《中国生活记忆》选取的,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。全书文风幽默轻松,以故事带历史,引人入胜。

当然,轻松并不意味着轻佻,全书写得认真动情,使历史细节及蕴含的情义呼之欲出,常常能击中人们心灵最敏感、最脆弱的地方,让人怦然心动。

全书在结构上,自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,至2009年,实行“计划单列”,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和新世纪年代依次展开,每个年代的开篇,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;每个年代的结束,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。如此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阅读便捷。

我与《艺海拾贝》

■ 郑 健

第二天一早,我告诉父亲学校要加课,便从床底下找出一把砍刀,出了县城。我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走了十来公里,到了一座名叫金厂梁子的大山上,用了两个多小时,砍了一担干柴。本来,我衣袋里的2角4分钱,再加4两根票,可以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吃两碗米线,但我不知道一担柴卖了够不够买《艺海拾贝》,只花1角2分钱吃了一碗,剩下的一半钱准备添买书。走这么远的山路,挑这么重的担子,一碗米线顶不了多少事,肚子里咕咕噜噜叫起来了。

下午3点多钟,我把干柴挑到县委会食堂后,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食堂的会计过完秤,递给我8毛钱。我一下子来劲了,三步并俩到了新华书店。可是,书架上没了这本书,一问售货员,被县文化馆买走了。我问书库里还有没有,回答全县只进了这一本。我回家吃了饭,想到文化馆去借,没想到书刚登记上架,就被人借走了,后来去了几次也都没借到。

没了这本书,我像丢了魂似的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,我放学回家,见桌上摆着一本《艺海拾贝》。下班回来的父亲告诉我:“县文化馆经费困难,连工资也发不了,上面通知可以折价处理一些图书,我就给你买回来了,4角钱。”

那天晚上,我一口气把这本近15万字的书看完了。此后,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,从学校到插队落户的西双版纳傣族村寨,从被调去工作的县报道组到部队,从云南到北京,许多东西丢了,这本书一直保护得很好。

一天下午,我将材料又改了一遍,交到



《艺海拾贝》不同的版本书影

于军代表住处,回来后乘空闲又拿出《艺海拾贝》看起来。忽然,楼下响起了鼓锣声、鞭炮声,我随手将书放在桌上,下楼想看个究竟。谁知返回后,见于军代表坐在桌子旁,铁青着脸。我意识到什么,嗫嚅着说不出话来。

此时,我们谁也没说话。过了一阵子,还是于军代表先开口:“报上已经批判秦牧了,批判《艺海拾贝》了,你是写‘学代会’材料的,还是‘学代会’代表,怎么能把这样的书拿到会上来看呢?”

“我……我在农村,看不到报纸,听不

到广播,不知道。”

……

待我回过神来后,发现桌上没了《艺海拾贝》,拉开桌子抽屉,没有,打开挎包,也没有。于军代表拿走了?这成了我的罪证了吗?

我的后背透出一股凉气,脑子一片空白,额头上沁出了冷汗。我在屋里翻腾起来。拉开枕头,枕头下有一本书:《艺海拾贝》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看了又看,真的,《艺海拾贝》!

我的心里涌上一股热流,两行泪水扑簌簌往下流,急忙追下楼去。于军代表走远了。

18年后的一天,在北京军区战友报供职的我从本报3版上看到一则广告,逝世的首长名叫于升鑫,其简历里任过某工区副政委。我找老编辑打听,得知他曾随工区部队执行过援越抗美任务,其间被抽调到思茅地区“支左”。我捧着战友报的双手,颤抖起来了。

老政委,我们怎么这样巧,又怎么这样不巧呢?

一次,女儿见我仍像过去老看《艺海拾贝》,就说,这书再版了,装帧很好,我给您买一本吧。

我说,不,这本最好。